

那年麓山青

——1977年高考，一个班级的集体回忆

主编 柳肃 副主编 王践 李鄂军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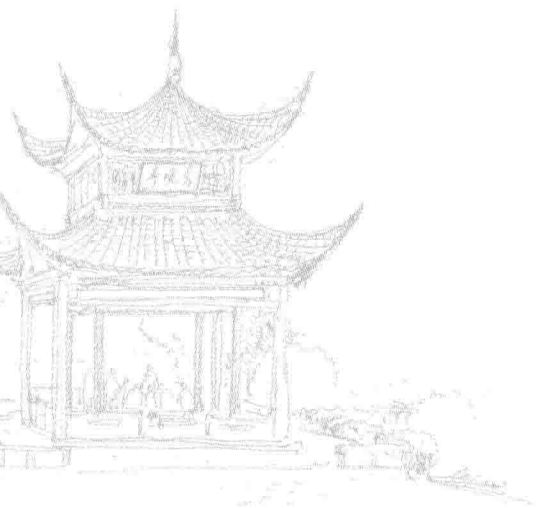


那年 麓山青

NANIAN
LUSHAN QING

——1977年高考，一个班级的集体回忆

主编 柳肃 副主编 王践 李鄂军

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1977年恢复中断了10余年的高考制度，实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的前奏、序曲和破冰之举，意义深远、重大。本书讲述了湖南大学1977级一个班级成员的高考故事，真实记录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生存之艰，求学之难，发展之困，奋斗之苦。反映了那一次时代转折的巨大意义，凸显了真实厚重的历史质感。青春理想、家国情怀蕴含在真实的叙事中，故事感人，催人奋进。

本书是对恢复高考40周年、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份献礼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年麓山青——1977年高考，一个班级的集体回忆/柳肃
主编. —长沙：湖南大学出版社，2018.3

ISBN 978-7-5667-1104-5

I. ①那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8638号

那年麓山青——1977年高考，一个班级的集体回忆

NANIAN LUSHAN QING

——1977NIAN GAOKAO, YIGE BANJI DE JITI HUIYI

主 编：柳 肃

责任编辑：卢 宇 陈 燕

印 装：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×1000 16开 印张：16.75 字数：292千

版 次：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：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667-1104-5

定 价：45.00元

出 版 人：雷 鸣

出版发行：湖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：湖南·长沙·岳麓山 邮 编：410082

电 话：0731-88822559(发行部)，88821315(编辑室)，88821006(出版部)

传 真：0731-88649312(发行部)，88822264(总编室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nupress.com>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，请与发行部联系

前言

近40年来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中国社会和媒体经常提及，这就是：1977级（中国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）大学生。而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历史上，一个年级的大学生被如此关注、重视和热议，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词，是非常罕见的。

1977级大学生之所以拥有这份殊荣和待遇，在我看来，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的优秀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群体的优秀——这个群体中产生了众多学界泰斗、科技翘楚、政界要人、文艺名流、商界巨擘等杰出的人才，而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特殊性。他们是站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、参加过一次特别的考试的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为清算“旧的”教育方针和制度，废止了高考招生制度，实行推荐入学，到1977年，高考恢复，考生570万，录取27.3万人，录取率4.8%。当我们提纲式地列举这些枯燥的史实和数字，并且和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尤其是高考演变的过程相比较时，更能感受到这个群体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气质。

这个群体的特殊性，还在于其具有先锋色彩、探索性质和开拓意义。要知道，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，极“左”的阴云尚未从中国的天空散去，而距离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一年的时间，那时，改革、开放、发展，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词，都还没有出现，更谈不上实践了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高考制度的恢复，不是简单的复制，而是一种破冰，一种尝试，一种极具智慧和勇气的挑战。因此，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们，便承担了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和开疆拓土的历史任务，扮演了亲历者、见证人和排头兵的特定角色，尽管他们并不是自觉的。

今天的年轻人，恐怕很难想象和体会到1977年考生们听到恢复高考时的心情，很难想象他们复习备考的艰难以及走进考场的感受。是的，十年历史灾难，十年学业荒废，十年心绪纷乱，十年理想崩塌，十年前途渺茫，这些现象

均在一个短短的时段内即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，那种冲击所带来的激动、亢奋以及种种复杂的心态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人，确实是难以想象和体会不到的。当他们怀着自信或忐忑去迎接这场十年未遇的大考时，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场考试的意义，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将相联系，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改造中国，他们也许只是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机会正在降临，原来模糊的道路正在变得清晰。他们的奋力一搏，成就了这个特殊的群体，造就了长久的话题。

这个群体中，有一个小小的集体，就是湖南大学 1977 级政治班。当年，43 个同学怀揣各种念想、理想，带着诸多追求、诉求，从湖南各地，从工厂、农村、学校、机关，集结于岳麓山下、湘江河畔，开始了四年的学习时光，同时开启了迄今长达 40 年的同窗情谊。尽管大家的生活经历不同，职业身份不一，报考专业迥异，但最终都在这个小小的集体中凝聚、历练、成长，并且在今后的岁月里相互关心、提携和帮助，有一种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的精神。

既是政治班，则他们有可能比一般人多了一些政治素养。2017 年适逢高考制度恢复 40 周年，大家都认为 40 年前的那场高考意义重大而深远，值得大书特书。于是，便有了纪念的想法，有了回忆的构思，有了出书的念头。短短几个月，从最初小范围的酝酿，到发动全体同学参与，再经反复磋商讨论，终于成书。虽说只是一个小集体的创作，但以小见大，既是 30 多个同学对那场高考的极富个人色彩的回忆，又何尝不带有 1977 级考生的共性？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和那段历史的折射？

回忆是一种奇特的心理活动，有回顾，有回味。我相信我的同学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，心情是五味杂陈的，但不管怎样，总会有一个词语让大家感到欣慰、感到自豪，那就是：1977 级大学生。

撰写本书前言，于我来说，并不很合适。因为本班同学中，能写善写的大有人在，有的著作等身，有的虽文字不多但出手不凡，由我来充当这个角色多少有点“赶鸭子上架”的意味，深恐辜负了同学们的厚望和期待。踌躇好些天，心念一转：不管自己水平如何，完成这个任务，表达一种情感，往小里说，算是对亲爱的同学、亲爱的班级的一份交代；往大里说，也是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引领者的一份感恩，总还是有点意义的。

于是，不揣鄙陋，抛出此文，切望众同学贵手高抬，诸读者海涵则个。

王 践

2017 年 10 月 26 日

目次

坎坷求学路

——写于恢复高考 40 周年之际

朱乐夫 / 1

那一年，我行走在两个春天之间

何向民 / 14

逐梦

曹宗贤 / 22

远去的记忆

——1977 年高考片段

符建湘 / 30

从祁山到麓山，我的人生转折

周安德 / 36

梦回那场考

周正刚 / 49

梦想、备考、真人、志愿

——我的高考轶事

侯振兴 / 60

想见世面 想换工作 那就去上学

秦群力 / 65

我的高考往事

冯建华 / 67

迟来的高考

朱汉民 / 78

1977 年高考追忆

陈相如 / 83

我的高考 陈彩霞 / 89

读书的权利

——1977 年高考回忆

曹立 / 91

无悔的选择

李英 / 98

1977 年高考，点燃了我读书的梦想

李强 / 105

恢复高考，圆梦 1977

柳礼泉 / 111

幸运儿	张 怡 / 124
冬天里的春天	谢自强 / 128
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	
——1977 级大学生高考入学见证	谢茂拾 / 135
我的高考记忆	王小波 / 145
我的 1977，我的高考	王维佳 / 150
那年冬天的点滴记忆	王衡生 / 159
跨越三关，奔向我的大学	邓 平 / 166
知青岁月的重大机遇	彭益民 / 172
我要读书	李鄂军 / 181
春天的回忆	黄赤青 / 189
那年那月遂宾兴	张功耀 / 193
奇葩朵朵的 1977 高考	易科瑜 / 217
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生	
——1977 的回忆	柳 肃 / 226
难以忘却的拐点	王 坚 / 237
赶考记	王 践 / 245
冬天里炸响的春雷	熊海斌 / 251
后 记	何向民 / 258

坎坷求学路

——写于恢复高考 40 周年之际

朱乐夫

引 言

无论是工作期间还是退休以后，每逢我与朋友、同事、领导聊生活，1977 年的高考经历都是我不太愿意谈及或者一笔带过的话题。不是我故作谦虚，而是感到这个话题有些沉重，总让我联想起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形。这次同学邀约共同回忆当年的高考，看来必须直面了。

确切地说，当年恢复高考时，我已经从偏远的湘南郴州来到了省城长沙，而且有一份自己喜欢、他人羡慕的工作，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迫切需要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参加高考的动因很直观，就是想要一个公平求学的权利。记得当我接到湖南大学录取通知书时，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从工作单位长沙师范学校（现为长沙师范学院）跑步到小吴门邮电局，给远在外地的父亲打了一个长途电话。当听到电话那端父亲的声音时，天性乐观的我满心酸楚，哽咽着无法说话。父亲在电话不停地叫我、问我，我才吐出唯一的一句话：“爸爸，我能够读大学了，湖南大学。”就是这句话，承载了我积压内心多年的委屈和不甘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强烈地感受到，恢复高考就是恢复了我公平求学的权利，这个我一直渴求而被荒谬地剥夺了的正当权利。

萌发在“文革”初期的求学欲

我和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大多数城里人一样，有着一个读书和玩耍并重

的少年时代，既不厌学，又无求学欲望。上学盼放假，下课玩游戏，就是当年孩童的生活状态。真正让我有了求学欲望的，是在“读书无用”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“文革”时期。

1966年夏，不到12岁的我从郴州市第四完全小学毕业，考入郴州市第一中学（简称郴州一中）初54班。上学仅一个多月，学校便宣布停课“闹革命”，这可让我们这帮适龄顽童乐翻天了。我居住的郴州地委大院，处于当地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心，秩序大乱，机构瘫痪，大人们全部卷入“四大”（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）之中。而我们这帮小伙伴，则是三五成群，整天四处玩耍：院子里打鸟，郴江河里摸鱼，苏仙岭上采野果。甚至几个人瞒着父母，学着大哥大姐的样，爬火车去“串联”。人家几乎全是北上，去北京或者去韶山、井冈山、延安等革命圣地，我们的目的地则是南下广州。大家商定，如果被拦截，就说原准备去瞻仰毛主席故乡韶山的，爬错了火车。这样沿途历经坪石、河边厂、韶关等站的几上几下，几位玩伴中途被遣送回府，最终剩下的五位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“铁道游击队”的方式窜到广州，以“毛主席故乡人”的身份，受到了当地“红卫兵”接待站的友好接待。我用从奶奶布包里要来的10元钱，进行了人生的第一场远游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被“文化大革命”狂浪冲击的地委大院，已经乱成一团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川流不息的游斗队伍，昼夜不停的喇叭口号，刀光剑影的武斗场面，不仅搅乱了每个人的精神世界，更直接摧毁了每一个家庭。小玩伴的家几乎无一幸免，今天这个的家里被抄，明天那个的父母被揪被斗。那些曾经在我们幼小心灵中神圣而威严的老红军、老八路、南下干部，瞬间成了“一小撮”和“牛鬼蛇神”，被关，被打，遭批斗，不时还会发生所谓的“自绝于党和人民”的自杀事件，令人心惊肉跳。玩伴们整天处于担惊受怕的恐惧状态中。我起初还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自己的老祖父和祖父都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，属于正儿八经的“根正苗红”，而且父亲还是郴州地区“大串联”接待站的负责人。未料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先是母亲因为担任小学教导主任，被定为小“走资派”，戴高帽子游街。没过几天，院子里贴出了关于父亲的大字报，其罪名居然是“国民党特务”。而接下来就是家被抄，人挨斗，直至锒铛入狱；全家被赶出来，住进了由竹篱笆搭建的、便于集中看管“一小撮”的“牛棚”；父母的工资全部停发，家属子女每人每月仅给8元钱生活费。

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，我们这些曾经生长在“红色家庭”里的“革命接班人”，瞬间沦为“走资派”和“黑五类”（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派分子）子弟，如同坠入无底的深渊，生活上形成了巨大的落差，心灵上受到了极度的摧残。一方面，我们开始为了维持生计而奔波，诸如到食品厂打小工，在采石场锤片石，在锅炉房捡煤渣，甚至在大街上帮人推板车之类，以每次几分钱、角把钱的收入补贴家用。另一方面，要承受看似永无止境的精神恐惧——每逢批斗会，我们这拨家属子女都要被拉去“观摩”，接受再教育，要与“走资派”“黑五类”划清界限；平日里要隔三岔五地集合训话，被训斥“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”。再就是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情、日复一日地进行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。

如此绝望的处境，迫使我开始关心起“国家大事”来。但越关心，就有越多的想不通：首先是自己父亲的遭遇，一个自己的爷爷、父亲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均被国民党杀害，经历了颠沛流离、随时面临被“斩尽杀绝”的人，一个多次因工作累倒住院的人，一个连国家发给奶奶一条棉裤作为烈属慰问品都要上交的人，怎么会是国民党特务？打死我都不相信。其次是周边这么多在枪林弹雨中拼着性命创建新中国的老革命，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成了“被批斗、被打倒”的对象？特别是地委宣传部长陈兵伯伯，曾参加过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（简称抗大）学员，居然因读报读错了一句话，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判刑 7 年。更不可理喻的是，那些应被天经地义视为恶行的打人、砸东西、抄家，居然一时间成了“造反有理”的人间正道？甚至有个别曾经的街头混混，一时间也成了“文革”闯将。一连串的疑问缠绕在自己心头，但就是不敢说、不敢问，以免招致不测之灾。

正在这时，《毛主席语录》开始发行，人手一本。我开始向伟大领袖寻求答案。按照当时那位“副统帅”的“指示”，我“带着问题”，平心静气地阅读了《毛主席语录》——这是我所读的第一本课外书。随后加上重新发表的《毛主席诗词》，我反复多遍阅读，以至于不少段落至今能够背诵出来。尽管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学语录、读诗词却在我的心里开启了新的一扇门。我不仅对毛主席的英明、伟大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而且对他的渊博知识、引经据典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，心想他老人家这要读多少书啊！由此萌发了找书看的念头。可是，在那大批“封资修”和铲“毒草”的年代，除了“红宝书”“两报一刊”的文章以及五花八门的传单，哪里还有书的影子？

好在机会来了。一天，一位玩伴在敲铜砸铁寻废品时偶然发现，那些被造反派抄家抄出来的“封资修”的东西，还未装运到造纸厂销毁，全部堆放在地委大院的一个大杂物间里。当时的造反派正受上海“一月风暴”的鼓舞，为“抢班夺权”打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无暇顾及此事。这对于我们几个求书若渴的铁杆玩伴来说，不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。我们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，笃定“窃书不算偷”的心态（一位玩伴说这是鲁迅的观点，后来才知道，是鲁迅笔下人物孔乙己之名言），立下“非书不取”的规矩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从杂物间里“顺”出了一摞书，每人分得几本。接着又如此这般地“顺”了一次。

我分得了二十来本书，有外国小说《牛虻》《铁流》《复活》《勇敢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有中国古典文学《醒世恒言》《封神榜》《聊斋志异》（下）、《活页文选》《古诗选》，以及一些文论和杂书等。有了这批书，我如获至宝，偷偷地藏床下，瞅着无人时或者夜里家人入睡后，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。凭借一本“顺”来的字典，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。这里有对牛虻式革命英雄主义的憧憬，有因《科学家谈21世纪》引发的求知欲望，有《封神榜》带来的诡异魔幻境界。只要一捧起书，心中仿佛涌出一泓清流，现实的烦恼顿时消散，积郁内心的困惑和不安都不重要了，体验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享受。而唯一的遗憾就是我那时还仅有小学的文化程度，许多书还根本看不懂，读不进。

在停课的近三年（1966年夏—1968年冬）里，中国社会经历了“串联”“造反”“武斗”“夺权”等一连串的大动乱，我个人则经历了由贪玩好耍向渴求读书、渴求上学的转变。

求学路上的两次厄运

1968年冬，虽然“文化大革命”依旧如火如荼，但波及全国的武斗趋于平息，社会秩序稍有恢复。大批“老三届”走进“广阔天地”，各地“革命委员会”（简称“革委会”）陆续成立，各单位、部门开始运转，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始了学校的复课“闹革命”。

1969年初，我们这些玩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入学通知，唯一遗憾的是，我一个最要好的玩伴没有收到，因为他父亲是郴州第二号“走资派”（当然，一个月后还是给了他上学机会）。由于当时积压了几届小学毕业生，玩伴们有上中学的，有上小学附中初中班的，而我仍然是上郴州一中。我当时的心情，

丝毫不亚于当年学校宣布停课时的那般兴奋。不料，此刻我却遇到了求学路上的第一次厄运。

去学校报到的那天，为了尽快地来到久违的校园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翻过大学的围墙，抄近路来到学校。记得报到地点在校办公楼前坪，因为来得早，人还不多，手续简单顺利。可是，在填写一份表格时，我却停顿下来，父母工作一栏一时不知道如何填写。一位 40 开外的中年男子见状走了过来，问我是不是不会填，又催着要快些。我只好硬着头皮，先在母亲一栏中写了个“待分配”，犹豫一会儿，又在父亲一栏写了“已拘留”。刚落笔，就听到站在旁边的男子哼了一声，从我手中夺过表格，仔细看了一下，板着脸问道：“你父亲犯了什么罪？”我说：“没有犯罪，有人说他是‘特嫌’，他不是。”一听到这儿，那男子凶狠起来：“什么有人说？人都关进去了，这还了得！你不能报到。”说完，他拿了我的表格就走。这犹如晴天霹雳，我顿时急了，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抓住他的手死死不放，口里争辩道：“我家是烈属，我家祖宗三代是贫农，你凭什么不准我上学？”“凭什么？我是工宣队的，我有权。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。”那一刻，我是豁出去了，抓他的手，抓他的上衣口袋，甚至抱他的腰，任他如何吼叫，就是不让他走。僵持中，过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（后来才知道是“三结合”进校“革委会”任副主任的罗正河老师）。他问了那位工宣队员情况后，看了我填的表。然后要我松开手，问我：“你妈妈是叫钟福慧？原来是在四完小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“哦！”他指着不远处的篮球场对我说：“你到球场那边的树下等一会儿，我们研究一下答复你，怎么样？”看到他一脸慈祥，我顺从地来到了球场边的树下。血气方刚的我，这时的情绪几乎失控。看到新生三五成群地走过，联想到父亲被关，母亲被游斗，哥哥年龄未满 16 岁就被强迫下乡，仿佛被逼上了绝境。我已经横了心，心想：“真不让我上学，我就要……”至今想起那一幕，我还深深地后怕，如果不是罗老师的出现，如果不是他据理力争，如果不是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“分配到一营一排”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样的蠢事。真这样的话，我的人生肯定会改写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与我母亲同在教育战线，以往就很熟，清楚我家是烈属，坚持我属于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为我争得了上学的机会。发生在报到之际的这场屈辱，我从未向人提过，包括父母兄长在内，但它实实在在我心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。

在中学时代（初中一年，高中两年）的 3 年中，主要是学毛著，学工、学

农、学军，而学科学文化的时间和内容少之又少，书刊教材也极度匮乏。而我，因为有了那场遭遇，所以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。我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，对每一堂文化课，都做到认真听、读、写、练；在课外，则更加着迷于阅读那些“顺”来的“藏书”，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之类的几本书，我读了至少两遍。所以，整个中学期间，我的成绩在班里是拔尖的。我的作文，多次被老师作为点评的范文；我的数学，曾因另类的解方程方法而被同学戏称为“乐夫斯基定律”。尤为庆幸的是，我遇上了一批好老师。他们头顶“臭知识分子”的帽子，身负沉重精神枷锁，有的还要经受残酷的批斗。而一上讲台，他们都成了知识的传播者，真理的布道者。化学老师郝清流，精妙地运用毛主席的《矛盾论》阐释事物中的化学现象（当时所必需），引出化学原理。第一堂课就以鸡蛋为例，分析为什么最香的东西可以变成最臭的，它的分子结构和质变条件，一下子就激起了同学们对化学的浓厚兴趣。数学老师李超（后为大学教授），把复杂的数学公式编成顺口溜，生动活泼，朗朗上口，使抽象枯燥的原理变成了乐趣。语文老师古庆、李子扬，以有限的课文为脚本，借题发挥，借力发力。在讲授《毛主席诗词》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》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等课文时，他们引经据典，古今中外无所不涉，在林林总总的“禁区”的缝隙中为我们开凿出知识的涓涓细流，把我们带入了知识的海洋。政治老师谢开庭，私底下送给我的成语“近朱者赤”以及“近圣者贤，近书者智”等格言不仅启迪了我的人生，而且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，激励着我。

从老师那里，我获得了知识，学会了做人；在老师身上，我看到了求学的方向，萌发了对大学的向往。当时，社会上流传恢复大学招生的消息，清华、北大开始试点，由此引发了同学之间对老师教育背景的议论，这个是大北生，那个是北师大毕业，还有武大生、中大生，令人羡慕。以往，我只是从那些“首都高校造反派”“北航红旗”之类的名号中知道了大学。这时，我从老师的形象中感觉到了大学的价值，觉得只有上大学，才有他们这样的知识水平。大学成了当时我心中的一种“朦胧美”和求学路上的新坐标。

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，国家开始恢复大学招生，班上一位我最要好的同学作为特招生直接被大学录取（这种招生方式由周恩来总理亲批，随后被批判为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而停止），令我羡慕不已。但是，当时的招生政策是“自愿报名，群众推荐，领导批准，学校复审”，录取标准有两条硬杠杠，一是

“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”，二是政审合格。对我而言，第一条还好办，毕业下乡干几年，就够条件了；关键是第二条，政审不仅要看个人的政治表现，更要看家庭的政治背景。而我的所谓“父亲的历史问题”，一直像是魔符缠身，驱之不散。本来，在我入初中不久，父亲得以脱离大牢，不久又补发了几年的工资。我觉得这个政治包袱算是已经卸掉，开始敢于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，写了入团申请，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。基于我的表现，初中毕业时，我被评上了全校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。但是，我的入团申请经班上团支部通过后，却被校团委否定了，原因仍然是父亲的历史问题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包袱并未卸下。直到两年后的高中毕业时，经过组织上的反复考验，也得益于国家开始落实政策，父亲进了“五七干校”（意味着不是敌我矛盾），我总算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这时我想，政审应该不成问题了。

在加入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大军时，我似乎看到了上大学的些许希望。下乡的第三个年头，我迎来了上大学的机会，却遭遇了求学路上的第二次厄运。我们这批知青是属于集体下放的，200 多人分别来自郴州市的各个中学和小学附中，地点是离郴州市 40 公里的郴州地区“五七干校”。知青按部队建制统为知青营，营下分设四连、五连和后勤排；营长、连长、教导员、指导员均由干校的下放干部担任。我被分配到五连，工作以水稻种植为主。下放当年，我就在老农的指导下，学会了犁耙，随后掌握了从插秧到收割的全套农活，成为全连四个拿最高工分——9.5 工分的犁耙手之一。第二年营部决定在连队配备知青副手，我担任了五连副连长、团委干部。我们这拨知青，直白地说，确有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之心，绝无“扎根农村一辈子”之志，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而已。他们有的想当兵，有的想招工，有的只想回城；而我，就是想上大学。下放时，我自己做了一个小木箱，装着那些宝贝藏书，放在自己的床头，经常看书到深夜。知青战友和带队干部都认为我能够上大学。

1974 年夏，“五七干校”接到地区招生办通知，要在我们知青中招收一批大中专“工农兵学员”，我内心充满了激动和渴望。知青战友们几乎一致推荐了我，营部和校革委也确定我为上大学人选，不料还是被刷下来了。当时的理由是，招生的大学是西北工业大学，搞飞机制造的，属于军工性质，身体条件要求极严，我的某项身体指标达不到。事已至此，我只是有点遗憾，并不怨天尤人，只想争取来年的机会。让我至今心存感激的是，营部和校委的带队干部并没有放弃，多次把我作为优秀知青向上面推荐并争取名额。于是，先后有湖



1973年，“五七干校”知青演出（右1为朱乐夫）

南大学汽车制造专业和湖南师范学院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）数学系招生老师找我面谈，并专门进行了单独的文化测试。他们均表示：“应该没有问题，等待录取通知。”可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，招生接近尾声，其他几位知青已经接到大中专院校的入学通知，而我却一直没有消息。尽管带队干部也在追问，可就是没有结果。我待不住了，回城来到地区

招生办，找到当时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咨询，除了得到诸如“争取明年”之类的安慰话外，从他们闪烁其词的解释中，我明白指标已被某些当权的关系人攫取，理由是我父亲还在政审期间。这让我非常愤怒，又非常苦闷。原本以为这已经不是问题了，父亲早已经从“五七干校”调回市里，暂时安排到郴州碳素厂工作，等待落实政策，怎么还属于“特嫌问题未下结论”的“政审期间”？回到家里，与父亲谈起这事，父亲只有内疚的眼神和安慰的话语。我非常了解父亲，自打湖南解放，他就在郴州工作，且在当地首脑机关的核心岗位，有着广泛的人脉，但他从不因私事去求人，“相信党，依靠组织”是他的处事原则，即便像我这样事关一生的大事也是如此。我对此从来不埋怨，并且由衷地尊重。为了不让父母过于自责和担心，我说出了至今还铭记于心的话：“爸爸，只要是凭本事，大学我一定要上，我就是憋不得这口气！”我带着满心的不甘回到了“五七干校”，是战友的安慰和带队干部的关心开导，帮我度过了艰难的心理调适期。

没有想到回来后不久，就得知父亲被平反，安排在郴州地区水电局领导岗位的消息，紧接着母亲也落实政策被安排在郴州市第五完全小学任副校长。事情发生得太有戏剧性了。后来才听说，是广州军区晏福生将军过问的结果。他与我祖父是战友，“文革”前与家父有过联系，后复出。更有戏剧性的是，我

又有了读书的机会。10 月下旬的一天，知青营张营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告诉我有一个长沙师范学校的招生指标，征求我的意见。他知道我想读大学，事先对这所学校的情况作了了解。他告诉我，长沙师范学校是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创办的，原来是叫长沙县立师范学校。1974 年初，由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老人向中央写信，要求恢复长沙师范学校，得到“当年恢复，当年招生”的批复，所以才有了招生结束后补招的机会。他一再强调，这个指标来之不易，是直接下到我们知青点的（估计与我已经在招生办挂上号及父亲的复出有点关系）。他还帮我分析，“五七干校”的干部们近期将陆陆续续落实政策，并回去工作；知青营下半年将开始招工征兵，近一两年基本上要走完。这里最终可能就是一个留守处（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），来年是否再招大学生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，他强烈地建议我去读。这对于我来说，实属两难，不去的话，必将失去读书的机会，今后上大学的可能性也渺茫；去的话，按当时的政策规定，读了中专还想读大学几乎不可能。好在是去读师范，当老师是我当时职业目标的首选。在“读书、当教师”念头驱使下，我做出了选择，离开了战斗三年的知青营，来到了长沙师范学校。

如果说上中学的遭遇给我心灵留下的是一道抹不去的阴影，那么大学之路上的厄运则给我心灵留下的是隐隐作痛的伤疤。那时的我，已经看不到上大学的任何希望，但内心又总有不甘，期望有一天奇迹出现。

高考恢复了我公平求学的权利

我在长沙师范学校一待就是四年。这个时期，国家经历了“批林批孔”，几位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等一系列重大事件，发生了改变国家未来走向的根本性变化。这个时期，我在学业上得到庄风梧、朱京范、陈冰修、余幼琪等多位名师指点，有《汉书》《鲁迅选集》（这是校图书室被我视为最有价值的书）等大部头名著为伴，学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两年后中专毕业，我留校当上了心仪的教师，走上了讲台，讲授中文和曲艺两门课程；接着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，兼任了校党总支的秘书；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我就被抽调到省教育厅“清查与‘四人帮’有牵连的人和事”专案组，参与当时全党的中心工作。这个时期，我渴求上大学的念头仍没有泯灭，每逢年度的大学招生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命运在跟我开玩笑：过去有读大学的机会，却让那些政治包袱给错过了；现在政治上解放了，却看不到上大学的

希望。

1977年夏，高校招生并未如期进行，社会上开始有了多种传言，我也在省教育厅听说了今后可能要恢复高考的消息。我心里虽有期盼，但更多的是焦虑和担心。因为像我这样的中专毕业生，不知道是否有报名资格。10月21日，广播、报纸播发了中央关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，并一再放宽报考条件，我和我的学生都可以报考。至此，我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，仿佛在绝望中盼到了希望。

学校领导和同事对我报考大学给予了支持和鼓励，也有一些同志给了我善意的提醒，希望我慎重考虑。记得报考前，学校党总支书记李梅林明确表态将全力支持，而校长王湘春则有所不同，为此他专门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。谈话中，他明确地表达了我报考大学的一种矛盾心情。一方面，他知道我想上大学，表示支持我报考，将在我备考期间的工作安排上予以照顾，希望我努力考出高水平，并相信我能考上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希望我留下。他帮我分析了很多因素：其一，我已经是学校的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，抽调到省教育厅从事中心工作，那边也非常看好（专案组领导确实向我提出了调动工作的想法，我因为喜欢教书而作罢），不上大学同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，倒是上了大学，失去了这个好基础怪可惜的；其二，长沙师范学校直属教育厅，今后肯定有条件送我上大学深造；其三，我已经23岁，应该考虑个人问题了，而且考上大学后，将不带工资，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；其四，据摸底，学校青年教师中只有我一个要考，而我曾经教过的学生，则大部分会报名，师生同堂考试，对我会产生心理压力。王校长的这番话，把利弊因素分析得那么细致全面，确实是他对我长期以来的关心、甚至偏爱的一次集中表达，令我非常感动。但是，他并不知道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“较劲”，并不知道我唯一期盼的是“英雄不问出处”、凭本事上大学的权利，因此也就无法知道参加高考对我所具有的特殊意义。我恳请他理解，表示即便考上了，将来我也还可以回来任教，并保证复习期间绝不影响手头的工作。

在高考复习阶段，我与所有高考人员一样，面临两大困难。首先就是时间紧，离高考不到两个月。我因为抽调到教育厅专案组，得经常加班，只有把工余时间充分利用起来。每天除工作时间外，四个小时的睡眠（晚上12点至凌晨4点），一个小时的晨跑，其余时间全部用在复习上，天天如此。临近考试时，专案组特批一周时间，让我集中复习。其次是无复习资料，当时的教材匿